第 10 卷第 1 期 2017 年 2 月

Vol. 10, No. 1, February, 2017

国际高等教育

欧洲危机

英国脱欧与欧洲未来 1

经济危机余波后的欧洲大学..... 3

学术诚信与腐败

学术诚信的全球挑战 5

印度高等教育腐败文化的分析..... 7

国际分校到底拥有多大自主权? 9

分校和跨国教育

新加坡“环球校园”愿景..... 11

国际分校如何从喧嚣中脱颖而出..... 13

中国中学教育中的跨国教育..... 15

国际化方面

国际咨询委员会：国际化的新局面..... 17

以色列专科院校中的课程国际化..... 20

世界一流大学

创造一流大学的卓越计划：起作用了吗? 22

资助世界一流大学 24

俄罗斯学术卓越的两个主要障碍..... 26

私立高等教育

越南的私立高等教育：治理与政策问题..... 29

拉丁美洲私立高等教育的关键存在..... 31

国家和地区

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的收入多元化与改革..... 33

西巴尔干地区的高等教育：近期趋势和挑战..... 35

新书速递 37

英国脱欧与欧洲未来

Fiona Hunter, Hans de Wit

Fiona Hunter: 意大利圣心天主教大学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电子邮箱: fionajanehunter@gmail.com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bc.edu

英国脱欧已成事实, 英国大学, 连同欧洲高等教育界仍深陷震惊和怀疑之中。学术界——包括工作人员和学生——是“留欧”的热情支持者, 他们所在的城市也强烈赞成留在欧盟, 赞成的人数超过 70%。由此引发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 英国退出欧盟是否也会导致英国的人才流失。目前, 英国约 5% 的学生来自欧盟, 他们组成了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 他们不仅为大学带来了多样性, 而且也为英国经济带来约 37 亿英镑的收入。然而, 签证要求和学费水平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欧盟学生申请率的下降。15% 的英国学术人员由欧盟公民组成, 他们正在寻求能保障他们地位和前景的方法。有关种族主义事件令人担忧的报道不断增加, 这也许会阻碍许多人继续在英国发展其学术生涯, 即便是在英国大学“留欧”趋向的大环境中。鉴于“脱欧”支持者强烈的反移民倾向, 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学者和学生很可能对英国的未来更加怀疑。虽然选民在选票上打叉时没有考虑到高等教育, 但结果对大学而言影响深远, 无论是对英国还是欧洲的其他大学都是如此。

在这一不断变化的时刻, 大学能做的就是通过向学生和教职员提供关于学习和工作权利的保证 (尽管是在短期内), 尽量减少干

扰, 但仍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鉴于英国大学在欧盟计划中的表现不够好 (其表现与其获得的经费不成比例), 一些英国大学实际上依赖于欧盟的研究经费, 所以, 外界对研究经费的关注度不断上升。能否继续参与“伊拉斯谟+”项目 (Erasmus+) 的未来同样也是不确定的。参考瑞士和挪威的参与模式可能会找到解决方案, 即利用自己的国家资源。但就目前看来, 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况且英国的经济状况也比不上这两个国家。

这些担忧涉及学术交流合作与共享、人才自由流动、参与国际网络等重要问题。缺少英国的欧洲高等教育区域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对每个参与国都造成了影响。

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在本世纪初, 人们未曾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当时的欧洲似乎正变得更为强大和融通。欧盟已从 15 个国家扩大到现在的 28 个国家, 欧元被 19 个国家作为单一货币使用, 申根区在 20 个欧盟国家和六个非欧盟国家中开放了边界 (尽管英国选择退出欧盟和申根区)。随着欧洲项目取得进展, 强大的内外部力量开始削弱其基础。在全球层面上,

纽约双子塔在 2001 年遭受袭击，引发了不稳定以及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一个更加统一的欧洲被一些人认为是解决办法，但其他人则认为是有问题的。2005 年，荷兰和法国选民拒绝了“欧洲宪法”（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2008 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引发了新的紧张和恐惧。随着欧洲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及难民紧急情况在其边界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分裂。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气氛也更为紧张。由于相关机构组织未能就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可信的解决方案，各国间的合作精神已被削弱，在欧洲的信心缺失也愈演愈烈。反欧盟的情绪在成员国之间蔓延，到目前为止，英国脱欧是其最引人注目的结果。

英国脱欧与欧洲高等教育区

欧洲高等教育区（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兴起于本世纪头十年，它的出现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基于伊拉斯谟合作的成功经验，“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快速发展，从 1999 年的四个参与国家增长发展至 2010 年的 48 个国家、5 600 所大学和 3 100 万学生。它最初的关注点是通过学位结构、学分系统和质量保证上更多的共通性来规范欧洲教育市场，但它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发展。结构和方法的融合不仅旨在加强欧洲内部合作，而且也是为了使欧洲大陆成为世界范围内更具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目的地。这是欧洲大学开始感受变革之风的时期，因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出现需要它们开创更具竞争力的方法、参与全球人才搜寻，并使自己具备国际视野。博洛尼亚进程为共同问题的共享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框架。

博洛尼亚进程被认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

改革，仅在 10 年内就实现了许多国家政府几十年来未能实现的目标；但是，该进程没有在不同国家和院校中沿着相同的道路演进，在变化速度和实施行动方针的成功程度上差异巨大。这些趋势因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而增大，全球化在欧盟不同成员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不稳定和波动，尽管大学本身是欧洲合作的坚定信徒和强有力的受益者。

我们如何前进？

英国脱欧有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无论大学如何强调自身有多么国际化或者欧洲化，然而，它们所处的国家环境将规定，有时甚至是限制它们的使命、范围和活动。这种政治结果有可能对大学的国际化产生负面影响，但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对跳出豪言壮语并有目的地重新连接国际化与学术价值重要性的认识。

更明确的意向性、将国际化融入院校使命和目标意识，可使大学展现由学生和学者组成的国际社区的价值和影响，首先是向它们自己展示，其次是向即将进行协商的政府展示。英国大学现正围绕多元化的重要性及其对大学成功重要性的问题发表声明，但大学须要清楚阐明国际科研合作及国际课堂和校园的意义，以及它们如何使所有大学成员受益。

大学需要找到表达国际化的其他路径，而不只是为了提高声誉和创收，并表明如它们目前在声明中所表达的真正包容性方法的重要性。英国大学是蓬勃发展基于欧洲合作的院校典范，并且，得益于欧洲合作，它们更加强大且更能践行其使命。前方道路艰难，但失去英国的欧洲高等教育区将是每个人的损失。

经济危机余波后的欧洲大学

Jo Ritzen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Maastricht University) 科技和高等教育国际经济学教授

电子邮箱: j.ritzen@maastrichtuniversity.nl

经过七年时间,经济危机似乎在 2015 年结束:大多数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再度回升。在危机期间,经济增速下降,税收减少,银行受助于公共资金,政府债务水平上升,(青年)失业率上升。政府削减预算,以满足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马斯特里赫特标准”(Maastricht criteria)。减少直接的生均支出以及(更不用说)减少学生资助(贷款和补助),这些都对大学产生了影响。尽管如丹麦、荷兰和瑞典等几个国家向欧盟外的国际学生收取全额学费,但除英国外,欧盟政府几乎不允许大学通过增加学费来弥补公共资金损失而造成的直接成本。

从银行的救助成本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减少方面来看,金融和经济危机对欧洲的打击程度比美国严重。大学和学生都有同样的感觉。欧洲大学协会(the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收集了 22 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其中,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在危机期间削减了大学教育(包括学生资助)的政府支出,希腊和匈牙利削减得最多(超过 40%)。有些国家(塞浦路斯、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不得不在欧洲紧急资金(the European Emergency Fund)的保护下寻求庇护,这些国家中的大学在资助直接成本、学生资助和研究方面受到重击。

欧洲竞争力下降

2000 年,欧盟启动了“里斯本战略”(the Lisbon Strategy),旨在通过高等教育和科研

的经济创新来提高区域竞争力。经济危机速度放缓,对一些国家而言,扭转了这一过程。在许多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仍需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债务,压缩用于高等教育和科研的政府支出。

欧盟的学生交流项目——“伊拉斯谟”项目,在危机期间有助于维持甚至提高学生流动。然而,欧盟内部的学生流动率(大学入学总人数的 4%)与美国学生流动率相比相对较低。尽管欧洲的语言差异仍是流动的主要障碍,但是一些家境富裕的学生从公共资金严重不足的国家(大部分在南部)流入西欧的流动性很可能会增加。

欧盟目前在大学学位结构方面相对一致,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层级,这要归功于 1999 年博洛尼亚协议启动的过程。然而,由于立法存在巨大差异,欧盟各大学的组织结构大不相同。在一些国家,大学仍受政府高度控制,很少享有自主权,无论是在财务、组织、教学法、课程、还是人员配置方面都是如此。在危机期间,大学改革实际上停滞了,或许是因为面对着其他的不确定性,变革的氛围不够有利。

大学毕业生的能力与大学的资助和组织有关。危机产生的影响降低了欧盟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因为它们取决于毕业生的能力。科研生产力持续上升,但可能是由于危机前的投资。危机对科研的伤害程度在未来会逐渐显现,特别是在危机期间经历严重经济衰退的国家(主要是南方国家)。欧盟框架计划(the EU Framework Program)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国家层面的科研费用削减，并鼓励融合，而“卓越计划”可能会产生两极分化，比如说德国的卓越计划。

欧洲西北部以及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大学似乎比南方的大学更能抵御危机。预计欧洲北部和南部之间的能力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对于“经济危机能够鼓励欧洲大学创新”这样的观点，我们少有、甚至没有证据证明这样的观点，无论是在学习内容、方法，还是在科研方面。

平等机会保障

较之于高等教育总公共支出，如果以学生财政援助的可获得性来衡量的话，欧洲高等教育平等入学的情况没有受到影响。在危机期间，欧洲国家大都放弃提高高等教育的私人（直接）成本以作为弥补公共支出削减

的一种方式。保证平等入学的欧洲传统，即低廉的学费或是直接免除学费，以及充足的学生资助，因有利于上层和中上层阶级（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进入大学）而受到严重批评。从这个角度来看，更高私人成本和社会贷款（该系统现存在于英国）的替代方案将更公平。然而，这种选择似乎不适合欧洲大陆的政治传统。

然而，较之于美国，在危机期间，欧洲在保持平等入学方面遭受的影响没那么严重。美国学费大幅上升，这可能会使其在通过高等教育提升代际流动性中失去优势。与欧洲（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有着相同的学生资助水平）相比，美国的经济危机使得来自中低收入群体的青少年在接受高等教育上更加困难。

学术诚信的全球挑战

Elena Denisova-Schmidt

瑞士圣加仑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讲师、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员

电子邮箱: elena.denisova-schmidt@unisg.ch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敲响了警钟: 在美国大学注册的国际学生通常比国内学生更频繁地作弊。根据报纸上的新闻, 在 2014~2015 学年, 美国公立大学每 100 名外国学生中就有五例被指控为作弊的案件, 而每 100 名国内学生中只有一例。据《泰晤士报》(The Times) 透露, 在 2012~2015 年间, 有近 5 万名大学生被发现作弊。根据报纸上的报道, 海外学生 (即来自欧盟以外) 作弊的可能性高于本地学生的四倍之多。在同一学年, 澳大利亚移民局 (the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in Australia) 因学术不端行为取消了超过 9 000 名国际学生的签证。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学术不端行为意味着什么呢? 学生参与的学术不端行为包括各种类型的欺骗, 例如代替另一个学生上课或考试、剽窃、以及通过提供服务、礼物、非正式协议或付款来交换录取名额、成绩、预先获得试卷、特殊待遇、毕业以及假学位等。

为何国际学生更有可能作弊?

许多作弊学生出现在具有地方性腐败的国家。俄罗斯及其教育系统的腐败程度较高, 在其几所公立大学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大学学习期间, 学生接受使用各种作弊技术的情况显著增加: “在考试期间使用未经授权

的材料”增加了 12%; “在考试时打小抄”, 增加了 25%; “从互联网下载学期论文 (或其他论文)”, 增加了 15%; “从专门机构或其他学生那里购买学期论文 (或其他论文)”增加了 12.5%; “就学业成绩不佳提供给教授欺骗性或误导性的理由”, 增加了 11%。研究结果还表明, 高年级学生比新生更在意大学里的贿赂——差异为 52%。俄罗斯学生表示他们需要死记硬背学习各种材料以及书写大量他们认为是“不必要的”课程论文, 以此来证明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

Sdaxue.com 是一个教育网站, 自 2013 年起一直对中国的文凭工厂进行监督。目前, 该平台记录了超过 400 家的虚假院校。虚假大学通常试图吸引那些高考 (国家入学考试) 分数低的学生或是来自小村庄和城镇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这些学校经常选择那些听起来与知名的现有中国大学几乎完全相同的名称, 例如北京土木工程和建筑学院 (the Beijing 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它使用来自 80 年代北京土木工程和建筑大学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的图片, 或是北京同济医科大学 (the Beijing Tongji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 一所只需花费 300 元 (约 45 美元) 即可获得学位的虚假学院, 其命名灵感很有可能来自同济医学院 (the Tongji Medical College), 一所顶尖的中国医

学院校。当这些假冒的中国院校暴露时，它们经常只是改变它们的域名并继续提供其“教育”服务。2015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现一家名为 Aexact 的公司在世界各地提供虚假在线学位。该公司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市，它每年的收入估计可以达数千万美元。

学术文化的差异可能是国际学生作弊的另一个原因。在许多国家，学生被期望重复老师提供的信息，而非质疑和反思；所有其他的意见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一些国际学生可能会遭遇融入西方“学术自由”的挑战，需要一些时间来了解如何工作学习。其他国家的以及使用其他语言的研究论文可能与在美国或英国所撰写的论文结构不同。此外，在许多国家，学术写作可能不是中学教育课程的重要部分。教学语言的指令不足可能是作弊的另一个原因。

大学能做什么呢？

2004~2014年间，在澳大利亚大学学生中进行的纵向观察表明，文本匹配软件和关注提高学术诚信意识的教育干预可能是成功的补救工具。然而，这可能仅包括某些可被教导和检测类型的作弊，例如没有标注出处

的简单复制和粘贴。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DAAD)与德国驻北京大使馆(the German Embassy in Beijing)合作，于2001年建立了学术检查组(Akademische Prüfstelle)，该机构负责验证在中国获得的所有证书，并与有留德意向的学生就其在本国学习的学科开展访谈。这种双重检查，连同语言测试，往往是中国学生入读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瑞士大学的要求。除各种反剽窃政策和程序外，结合使用反剽窃软件程序，如 Turnitin 或 Unplag，教师应更清晰地向学生呈现其作业和期望，规定其文化和教育背景。然而，对教师有此期待和需求似乎有点困难：终生教职人员有发文压力，而教学对于晋升似乎不太重要；非终生教职人员正面临着延长合同的压力；而且管理层不太想失去国际学生，因为他们是大学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公开谈论这种不当行为，因为它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这些不正确的依赖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水平不足的人或伪造文凭的人有可能身居要职，他们的无能可能会导致涉及人类生命的危险错误。大学应该承认这个问题，并动用所有必要资源来减轻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

印度高等教育腐败文化的分析

William G. Tierney, Nidhi S. Sabharwal

William G. Tierney: 美国南加州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高等教育教授、
Pullias 高等教育中心联合主任

电子邮箱: wgtiern@usc.edu

Nidhi S. Sabharwal: 印度新德里国立教育规划和管理大学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副教授

电子邮箱: nidhis@nuepa.org

所有大学都有个别人做出不可接受的行为。学生在考试中作弊, 教授在实验中伪造数据, 学院院长通过欺诈粉饰自己。虽然单一腐败行为不可接受且必须加以谴责, 但它们是个人的错误, 不同于系统性腐败。在整个系统陷入不道德的行为且渗透于院校和全系统层面中时, 系统性腐败就发生了。

许多人担心印度的高等教育制度是系统性腐败的典型代表。当涉及数千人代替学生进行体检的欺骗丑闻曝光时, 印度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专业课程入学考试的答案仍常常被泄漏。家庭成员爬上墙头帮助子女作弊的图景铭刻在国家的记忆之中。

问题是结构性的。一个多世纪以前, 印度政府面临一个两难局面: 它希望大幅增加在高等院校就读的学生人数, 但缺乏足够的资金。因此, 私立的非营利性大学挺身而出。根据人力资源开发部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的记录, 印度有 35 357 所高等教育机构和 3 230 万学生。其中, 22 100 所院校是私立大学。超过 60% 的私立和公立院校只有不到 500 名学生, 20% 的院校学生数不足 100。虽然很多人说这个系统充斥着腐败, 但大多数人却被 22 100 所私立大

学困扰。大多数新闻报道涉及的是那些学生人数不足 500 人的院校。

无人声称所有私立院校都是腐败的; 但大规模调查也不会涉及并报道不诚实做法的数据。谁会在调查中承认它们参与腐败呢? 然而, 我们下面讨论的活动是印度高等教育参与者都承认的。根据法律, 私立院校是非营利性的。然而, 它们的管理方式已通过“黑钱”或贿赂赚取利润。私立学校使多个参与者为自己和他人创收。

腐败的驱动者

求学中介 (agents): 学生通常不直接去到大学, 而是经过“中介”或中间人。学校也依赖代理人, 以便可以录取足够数量的学生。中介向学生收取佣金, 方便学生入学, 并与学校校长协商学费折扣。中介也向学校收取提供大量住宿的佣金。

学生: 学生付钱并期望获得学位, 但不想上课。他们经常把自己称为“非出勤的学生 (nonattending students)”。机构可以说是满足了学生的这一想法。他们不上课的原因各不相同。学校可能远离学生的家乡, 或是学生可能有工作义务。学生在考试时可能出

现或是满足学校最低限度的要求。教师则是通过电子邮件将课程发送给学生。有时候，学生如果可以的话，也会到学校上课，这取决于他们方便的时间。学生们记笔记，展示其学习成果，把功课带回家，并尝试了解课程。然后，老师会给出最终成绩，使他们能够参加大学考试。学校的考试通过率大都是100%。

院校领导：院校领导通常控制系统以期最大化其财务收益。策略之一是让教师和大学校长“名存实亡”，以满足管理机构规定的人员配置标准。因此，教师可以列为全职员工，但实则不是。老师名义上获得全额薪资，但向学校返还其大部分工资。学校文件中似乎有完整的教师名单，教师什么也不做就能获得收入。

此外，教师和/或大学校长可能参与大学招聘流程，为学院和招聘者创收。“jan-pehchaan”（社交网络）系统使机构领导者能够掌握机会并维持他们的商业利益。校长也许会担任中介的角色提供生源，从学生那里收取佣金，并通过协商使学生获得较低入学费用和代虚拟上课以作为回报。

视察委员会：大学管理层努力确保其机构符合大量有关日常管理的规定。当政府指定的委员会实地考察以评估、审查或对大学进行排名时，管理层便隆重接待。学校付给实地考察委员会官方金额。然而，在考察能力薄弱（或时完全不存在）的院校时，实地考察委员会成员可能要求“官方”数额十倍以上所谓的“shraddha”的佣金（基于信任的佣金）。

那些造假学校没有任何校舍，或者它们有一幢楼却是空无一人。有时，视察小组被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建筑物以避免空荡荡的房间。这些学院能够运作是因为金钱交换。也就是说，院校向官方机构支付大量资金以获得经营许可。一旦获得初始许可证，它们就向视察小组支付资金以便其为它们提供正面评价的报告。

结语

印度或任何面临系统性腐败国家面临的挑战在于，文化精神贯穿个人行动。如果学生在考试中作弊，且该机构谴责作弊，则矫正异常行为的过程是清晰可见的。但是，在“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文化中，改革更加困难。如果黑钱是规范而不是例外，那么，改变的动机就不大。偶然使用诸如“无人看守的学生”这样的短语强调了这样一个系统，该系统被操纵以使个人可以购买学位。当个人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获得报酬——或是在实地考察或考试中给出特别分数而获得报酬——腐败就是普遍性的。

系统改革的第一步是意识到存在问题。印度有着卓越的高等教育史。世界上第一个寄宿制大学是印度院校——五世纪的那烂陀大学（Nalanda）。印度产生了八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学传统。为了克服削弱信心和质量的腐败，印度史诗般的历史应成为促进科研和劳动力发展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原型。目前，支撑印度教育系统的伦理基础正被侵蚀，破坏了互信基础和教育标准。

国际分校到底拥有多大自主权？

Megan Clifford、Kevin Kinser

Megan Clifford: 美国俄克拉荷马市独立顾问

电子邮箱: megan.e.clifford@gmail.com

Kevin Kinser: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教授、教育政策研究部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主任、跨国教育研究小组 (the 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 联合主任

电子邮箱: kpk9@psu.edu

在过去二十年中, 包括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中国在内的几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利用公共资金支持国际分校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的建立和持续运作。它们赞助国际分校并非是为了支持外国院校对国际化的兴趣, 或是提高其自身国际排名。这些政府证明其使用公共资金是合理的, 因为国际分校对其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于国际分校帮助承办国 (指作为海外分校校区建址的国家) 提高教育程度, 满足当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减少人才流失。这就是对承办国而言所具有的意义, 而主校的目标则是次要的。

因为这些海外分校有望实现其承办国的目标, 所以校园必须满足特定的要求和规定。例如, 马来西亚要求海外分校提供专门的学术课程, 并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 同时限制了它们对利润的利用。虽然主办院校可以就这些条款进行谈判, 但海外分校一些最基本的财务、学术和治理决策都经由承办国决定或严重受其影响。因此, 建立海外分校的主办院校很少有完全的自主权来做出核心决定, 而这些决定在主校区则通常是由学校自己全权掌控的。

自主性的限制从如何得到建立海外分校

的机会开始。伙伴关系的要求使另一实体的利益混合其中。因此, 财政自主受限; 尽管有所保证, 但学术自主也总是需要反映承办国的议程。

机会识别

大多数机构识别海外分校机会的过程确立了一种从一开始就限制独立决策的动态。寻求接收海外分校的国家通常向愿意实现其目标和要求的院校提供资源, 例如土地、运营费用或设施。例如, 韩国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校园, 可以为 2 万名学生提供宿舍以支持好几个分校。主办院校应该接受校园的条款和条件, 包括其位于首尔外两个小时可达的地方。虽然主办院校积极协商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并可能摆脱一个不良交易, 但承办国在这一进程的早期阶段提出的建议从一开始就限制了海外分校的自主权。

合作伙伴关系

此外, 如果主办院校选择寻求给定的机会建立海外分校, 如没有当地的学术、政府或私人合作伙伴则很少能够成功。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 甚至在法律上也需要地方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帮助母体院校在管理

承办国家复杂学术、法律、商业和文化环境中指路领航。但它们也确保承办国在这项投资中的利益得以维持。因此，海外分校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其合作伙伴是否有能力维护协议的条款，并提供持续的指导。因此，院校自主进一步受到海外分校对当地合作伙伴必要依赖的抑制。

财务自主

对财务事项的限制也说明海外分校并非完全自主。一些承办国对于海外分校可以收取多少学费、如何使用利润或把利润调回本国进行限制。这些财务事项是财务自主权的关键要素，对于提高机构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此外，政府和合作伙伴提供的财政支持也对院校自主权有着显性和隐性影响。显然，协议可能会概述专门的要求和规章，以换取资金。暗地里，资金会激发可能影响海外分校选择的满足情绪。例如，在卡塔尔，政府提供了慷慨的财政支持，海外分校不必担心要自我保护以免受潜在的经济损失。这种情况可能会阻碍海外分校独立思考，以及积极主动地寻找提高其质量和可持续性的方法。

学术自主

也许，与有限的决策能力最为相关的一大领域就是海外分校的学术事务。当承办国请求母体院校在特定学习领域建立海外分校时，情况尤为如此。例如，卡塔尔基金会（the Qatar Foundation）邀请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和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分别

提供外国服务、工程和艺术课程。卡塔尔政府推动了学术课程的选择，而非主办院校。

在其他情况下，承办国限制海外分校提供新学术课程或具有独立招生过程的能力。中国将其接收的许多海外分校作为现有大学的一个部门，并允许该大学决定学术课程和招生。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分校只有有限的课程开发机会，并且永远不能成为充分发展的大学。这限制了它们的成长，使它们更易受到学术环境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影响。

结语

本文强调的这些限制有悖于学术界在世界一流院校中所期待的几种主要的自主形式。如果被认为是次要的高等院校，那么国际分校仍将难以吸引和保留高质量的教师及行政人员。因此，海外分校将努力实现与其主办机构同等的质量。

对自主权的限制也可能会为承办国的目标带来质疑。虽然承办国注重提升质量并确保与其目标保持一致，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它们可能会发现潜在的合作伙伴拒绝开设海外分校。这实际上可能会威胁到承办国总体构想的成功。

最值得注意的是，不断减少的自主性威胁到海外分校的可持续性和质量。限制海外分校的灵活性以进行业务或学术变革，从而响应学生和当地经济的需要，这可能会增加其失败的可能性。

鉴于这些挑战，海外分校领导者应考虑一种强调共同目标的方法，同时灵活地实现这些目标。否则，海外分校可能会依赖其接收国以成为教育的提供者，而非成为有能力进行自我规划的高等教育机构。

新加坡“环球校园”愿景

Jason Tan

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政策与领导力研究副教授

电子邮箱: engthye.tan@nie.edu.sg

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在 2002 年的一份报告中概述了“环球校园” (global schoolhouse) 的愿景。报告中的一个部分聚焦于教育行业。该报告称, 新加坡可以在一个估计高达 2.2 万亿美元的世界教育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新加坡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在 2015 年拥有 15 万名自费国际学生, 高于之前估计的 5 万人。

报告中也概述了实现这一愿景的若干经济优势。例如, 院校支出和外国学生支出的增加将促进经济增长并创造高薪工作。其次, 外国学生的涌入将促进人力资本用于基于知识的活动, 如研究和开发、专利生成和企业发展。再次, 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以及更多的课程将有助于阻止国内学生流入海外大学。最后, 外国学生将充实新加坡的人才库, 并在世界各地建立一个国际校友网络。

该报告建议将一个三层结构的大学系统作为环球校园的核心。顶端是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大学主要关注研究生教育, 并将是致力于研发的“利基中心”。第二层是三所先前就存在的公立学校——新加坡国立大学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南洋理工大学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和新加坡管理大学 (the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所谓的“基石”大学, 开展研发活动, 提供大量接受国内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源以满足国家需求, 通过奖学金吸引该地区的学生, 实现教育作为公共

物品的概念。形成金字塔的基础是“额外的私立大学”。这些大学将重点放在在教学和应用研究之上, 并服务于“环球校园”愿景中另外的 100 万名外国学生。

社会环境

环球校园愿景是一系列政策倡议中的最新成果, 这些政策倡议宣扬了教育在支持国家经济竞争力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它也代表着教育的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转变。1996 年, 时任总理宣布政府打算将新加坡变成“东方波士顿”, 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和麻省理工学院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榜样。接下来, 国家附属的经济发展局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 于 1998 年宣布, 它打算在未来十年内吸引至少 10 所所谓的世界级大学来到新加坡。该倡议努力吸引著名院校, 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芝加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以及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 ——一所法国研究生商学院。环球校园项目符合长期以来欢迎外国学生的政策。

阻碍

从一开始, 环球校园倡议就遇到各种困难。首先, 有几个令人相当尴尬且广受关注的案例, 外国大学撤销其在新加坡的分校和

课程，或是要求在几年后终止新加坡业务。

例如，国家资助的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在 2006 年 7 月宣布，它将关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医学研究设施，因为后者未能招聘预期数量的博士生。此外，尽管自 1998 年以来已收到超过 5 000 万美元的经济发展局资金，但该研究设施未能达到其 13 项绩效基准中的 8 项。另一项失败案例就是，2007 年 2 月，在新南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的亚洲分校开学四个月后，位于悉尼的主校宣布，新南威尔士亚洲分校将于同年 6 月关闭，因为学生人数不足以及人们对财务可行性充满担忧。

过去几年中，新加坡的“环球校园”遭遇进一步的挫折，宣布关闭另外三个校园。2012 年，纽约大学 Tisch 艺术学院亚洲分校（the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Asia）决定终止其在电影、动画、媒体制作和编剧方向的硕士课程。尽管该校收到了来自经济发展局约 1 700 万美元的财政补贴以及来自纽约大学的额外资金，但学校在五年的运营中一直遭受财政赤字。

2013 年，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表示，它将把高管教育项目从新加坡迁移到香港，以便更贴近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时，位于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vada）分校宣布终止其酒店管理本科课程，其理由是财务可行性。另一个争论涉及的是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the Yal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ollege）。2011 年，该校作为两所大学之间的合作企业成立，它受到了耶鲁大学的一些教师和人权倡导者的批评，他们质疑一个致力于自由探究的人文艺术教育是否

能在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得到发展，因为此类国家对自由言论和集会有着严格限制。

除了这些受人关注的争议外，“环球校园”倡议面临的第二个困难是质量保证。本世纪头二十年发生了几起涉及私立营利性学校的欺诈案件，它们突然关闭并未给学生留下任何进行财务或学术补救的资源。从最初宣布该倡议到议会通过《私立教育制度法案》（the Private Education Act）以规范所有颁发学位、文凭或证书的私立教育机构，一共花了七年时间。

第三个挑战，同时也是最近面临的挑战就是公众对自由移民政策的可持续性的讨论愈发激烈。执政党在过去几年中因限制移民而承受压力。移民政策方向的改变将对新加坡成为教育中心的希望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

在宣布“全球校园”愿景十四年之后，达到 15 万国际学生的目标仍然遥遥无期。2014 年的新闻报道称，外国学生人数从 2008 年的 9.7 万人下降到 2012 年的 8.4 万人和 2014 年的 7.5 万人。同年出版的一项汇丰银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的调查显示，外国学生对在新加坡的就业前景和生活费用表示担忧。两年前，贸易和工业部长告诉议会，全球校园举措强调教育质量和经济相关性而非学生人数或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他的声明隐约表明，15 万自费国际学生的原始目标可能无望达成。

注：本文也发表在《东南亚高等教育及其未来》（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中。

国际分校如何从喧嚣中脱颖而出

Rachael Merola

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 (the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资深研究员

电子邮箱: rachael.merola@obhe.org

跨国教育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如同肆无忌惮的野兽。其形式之多, 难以描述。加之跨国教育持续不断的变化, 使得对其下一个具体定义成为一项大胆尝试。特别是国际分校在其 150 年的历史中, 在规模、范围、所有权和支持框架等方面不断发展、更加多样化。但在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跨国教育中, 是什么将国际分校与其他教育机构区别开来的呢?

什么是 (不是) 一所国际分校

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与纽约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的跨国教育研究团队 (the 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 将国际分校描述为“一个实体, 至少部分由外国教育机构拥有; 以外国教育机构名义运作; 并提供对整个学术课程的参与, 大部分是实地教学, 最后由外国教育机构颁发学位。”

目前全球有约 250 个高等教育机构符合全部以上描述, 许多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满足其中一些条件但并非所有要求, 也被认为是国际分校。在这些高等教育机构中, 出现了某些共同特征, 这使我们可以识别出不属于国际分校的外国高等教育基地的常见类型。

例如, 仅有部分实地管理学位课程 (大部分在另一校区进行) 的校园不被视为国际分校。一些校园被用作本科交换学习或是具备国际学习组成部分的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EMBA) / 工商管理学硕士 (MBA) 课程的海外留学中心。由于相当一部分的学位课程在其他地方完成, 因而这些模式不被视为国际分校。

在另一个例子中, 不要求学生参加实际学习的校园也被排除在分校的定义之外。这就排除了许多大学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提供的众多远程学习项目, 这些大学的外国基地被用于招纳、注册、测试或其他非学习目的, 但很少或是没有面对面的教学。

非国际分校跨国教育的第三个通用模型指的是, 授予海外分校学位的是某一实体而非大学主校, 例如, 印度的双联学位课程或是新加坡博雅学院 (Yale-NUS), 后者是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运营的新加坡文理学院。这些都被排除在分校的定义之外, 因为该机构的控制权属于外国合作伙伴。

国际分校的特点

根据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的最新统计, 过去五年中已有 60 多所国际分校开始运行。对这些分校的观察揭示了几个显著的特点。特别在于, 许多分校一开始提供的课程项目都相当有限, 紧接着就是针对性扩张以及谨慎响应市场需求的策略。就现有数据而言, 过去五年中开设的 21 所国际分校现提供超过五个学位项目, 仅有九所分校提供的课程项目超过十个。这些小型分校是否将增长到其母系院校的规模或是仍保留其小规模,

都取决于这些院校的战略以及成功的努力。

分校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涵盖了一些所有权和治理模式。在一些国家——其中许多是国际分校的所在国，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新加坡、卡塔尔和马来西亚——通常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有时由政府控制；这与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所看到的自主治理模式截然相反——这些国家是教育出口的主要参与者。在制定对于一所国际分校的治理时，这些跨文化动态需要敏感性和意识进行指导。

一些大学把国际分校视为一种根据教育输出国教育制度而非东道国教育模式提供教育的方式。特别是在学术自由相当有限的国家，国际分校计划及运行已经停滞和/或遭到教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反对。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New York University in Abu Dhabi）、中国昆山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Kunshan in China）和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in Malaysia）就遭遇了这种情况。尽管遭到反对，以上三所学校仍坚持不懈，同时学校要求领导层就发展分校如何能够融入本校战略规划进行及时沟通。

虽然一些国际分校由主校区全权掌控，但大多数分校都从东道国获得某种支持，无论是在财务、后勤还是基础设施方面。在某些国家，特别是那些有教育中心的国家，分校与东道国征服建立伙伴关系，这样的形式是非常常见的；也就是，当地地方或国家政府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补贴当地校区的费用。反过来，政府有权随时取消其支持。韩国的仁川全球校园（the Incheon Global Campus in

Korea）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迄今为止吸引了四所外国院校到此开设分校。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建设运营费用完全由阿布扎比政府承担。同样，昆山市为昆山杜克大学的实体校园提供了土地和校舍。

国际分校的另一特点是，通过其名称，可以清楚识别它从属于母体院校。虽然许多跨国教育存在于通过特许经营和创建全新院校之中（即由美国营利性教育机构劳瑞德国际大学网络 [Laureate] 运营的澳大利亚托伦斯大学 [Torrens University Australia]），但几乎所有的分校都在自己的名称中保留了母体院校的名称。例如，法国高级时装学院（the Ecole supérieure des arts et techniques de la mode）的所有分校的名称都包含“ESMOD”，尽管学校名称的其他部分是根据当地情况而设定的。同样，槟城医药学院（Penang Medical College）在其徽标中显示其与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in Ireland）——其主办院校的关系。

结语

通过精炼什么是一所国际分校，以及什么不是一所国际分校的定义，跨国教育的全景得以浮现。由此，我们看到了现有国际分校的广阔前景，在国际分校的定义之下，呈现了各类国际活动、所有权模式、名称代表性、学术供给的规模和范围。对于这些分校的最新观察将在即将发布的国际分校报告中呈现，将由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和纽约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跨国教育研究团队于2016年11月发布。

中国中学教育中的跨国教育

Fion Choon Boey Lim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学院 (Victoria University College) 质量协调员

电子邮箱: fion.lim@vu.edu.au

中国的跨国教育在过去十年受到了很多关注。但该领域的文献一直聚焦于学位层次,与此同时,双学位合作也日益受到重视。而中国中学阶段渐增的跨国活动则少有人关注。

在中国,中学教育第一阶段的三年是义务教育(初中)。第二阶段则包含三年的非义务学习(高中)。在高三年级,学生们参加国家大学入学考试(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也即“声名狼藉”的高考(gaokao)。高考也因为学生和学生对考试结果的担忧而闻名。然而,近年来,许多中产阶级父母的财富增加,加之允许并开放在中学阶段发展国际合作,都使得中学教育阶段的跨国活动越来越多。中外合作的增长趋势清晰可见,国外(通常是西方)课程与中国公立或私立学校合作提供,通常作为外国学位的保证途径。至今,几乎没有关于中学跨国教育活动的研究、讨论或争论。然而,鉴于其增长率,中国政府的管理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

国外中学课程的增加

在中国,国外中学课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自 1991 年起就开始提供“国际文凭”课程(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又简称为 IB 课程)。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一个繁荣时期,当时,现代中国开放其对外贸易市场;但外国教育,特别是在中学阶段,受到

了严格控制并被认为是相对难以融入的。然而,近年来,中外中学合作出现了新的趋势。一些中国中学与外国学校合作提供大学预科课程。剑桥普通教育证书会考(GCE'O')和英国高考(A-levels)等剑桥国际考试(the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澳大利亚 VCE 课程以及其他各种预科课程都得以推广。

许多从国外中学项目毕业的学生发现,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国外,他们都比较容易进入外国大学课程,而这正是这些外国中学课程的目的所在,即为中国中学生做好接受外国大学课程的准备。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已有 100 多所学校提供了“国际文凭”课程,在 2002~2012 年期间,72%的国际文凭课程毕业生已被世界 500 强大学录取。剑桥国际考试网站上至少列出了 50 所中国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就读英国大学或世界其他认可 GCE 成绩高校的替代途径。许多中国学生也通过在中国的黑利伯瑞国际学校(Haileybury International School)进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大学。黑利伯瑞国际学校是位于墨尔本的一所独立院校,也是该地区早期的行动者之一。在中国,该学校作为一所私立国际学校建立,为澳大利亚 VCE 项目提供七年级课程,并声称其许多毕业生都已被澳大利亚顶尖大学录取。

中国中学跨国活动的增长可归因于几个因素,其中之一是,较之于中外合作学位项

目，提供外国高中课程似乎在获得中国教育部的批准上相对容易。这一领域没有涉及定额分配制，且物价局（Pricing Bureau）不参与该领域事务。事实上，启动国外中学课程通常只需获得省政府或市政府的批准。同时，不同政府与中国建立的贸易联系也进一步促进了增长。

管理数量增长和质量：教育机构需要注意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中国中学的跨国活动在商业驱动的环境中繁荣起来，在这种环境中，需求、价格和增长都是由竞争驱动的。但是，在中国的中学课程中，中外合作增长的速度能达到何种程度？速度又能有多快呢？

这些中外合作大多集中在一线和二线城市，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城市中有相当多的中产阶级家庭。然而，与本地高中相比，人们对外国中学课程的支付能力，特别是大学预科课程，可能会阻碍外国中学课程的发展。在上海一些学校的“国际文凭”课程每年可能花费高达 28 万元人民币（43 000 美元）。对许多家长而言，这一费用还是相当高的。

父母不愿让他们的孩子放弃参加高考的权利，这可能进一步阻碍了外国中学课程的

发展。许多富裕的家长选择让其子女参加国外学习课程，这样，学生压力会小些，也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入读海外大学的途径，并在许多方面为学生参加外国学位课程做更好的准备。然而，大多数中国父母仍选择风险较低的方法——让其子女完成学业负担繁重的两种课程——一种是国外院校提供的，一种则是中国中学提供。

中国中学教育中跨国教育的前景

历史表明，在教育方面，缺乏强力质量监督的快速增长会带来灾难。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地区和大陆地区均在不同时期加强了对跨国学位和私立教育机构的评估和审批流程，特别是当增长速度超过质量控制时。大学须拥有完善质量保证机制的论点并未成功说服质量保证机构，也并未证明其在限制这些国家中质量受质疑的项目上是有效的。因此，在中国政府引入更严格质量保证体系的情况下，预测中国的外国课程的快速增长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达到一个转折点，这是不合理的。在这一点上，人们会质疑中国对跨国教育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它会导致“供应链”中的跨国活动进一步下移吗？跨国教育活动的增长会转移到小学，进而转向学前班吗？

国际咨询委员会：国际化的新局面

Philip G. Altbach, Georgiana G. Mihut, Jamil Salmi

Philip G. Altbach :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创始主任、科研教授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Georgiana Mihut: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电子邮箱: georgiana.g.mihut@gmail.com

Jamil Salmi: 全球高等教育专家

电子邮箱: jsalmi@tertiaryeducation.org

世界一流大学,或是那些渴望拥有世界一流大学地位学校的最新秘诀是国际咨询委员会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IAC)。德国海德堡大学 (Heidelberg University) 就有这样一个咨询委员会,由前牛津大学副校长领导;莫斯科的高等经济学院委员会 (the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committee) 由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担任主席;几所著名的沙特阿拉伯大学拥有由顶级学者和少数企业高管组成的委员会。世界各地——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和韩国——仅提及少数几个国家,都推出了国家卓越计划,这常与在院校层面设立此类咨询委员会有关。事实上,一些国家已规定那些参与重点建设计划的大学需设立此类委员会。

我们将国际咨询委员会定义为:主要或完全由国际成员组成的院校外部咨询机构,服务于行政和治理的上层。

全球化创造了一个环境,其中国际专门知识和关系网络已成为渴望世界一流地位大学的必需品。也即大学必须追求最高的研究标准,在某些情况下,也必须追求最高教学标准,国际经验和专业知识对实现这些目标

大有帮助。在获取如何最好地组织和建立顶尖科研密集型大学的全球知识上,国际咨询委员会被视为路径之一。国际咨询委员会体现的是,一所大学拥有国际化视野,接受来自顶尖大学领导和世界一流院校学者的建议,且它可以用最好的国际实践对自身进行“标准化”。有人认为他们需要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因为其同行大学也有委员会。大多数人希望利用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声望,并希望委员会成员成为该大学在国际上的非官方代表。

国际咨询委员会：实质如何且如何运行

我们最近进行的研究进一步阐明了什么是国际咨询委员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可被视为对学术治理国际化作出贡献,尽管在任何情况下,委员会均不具备决策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国际咨询委员会有 6 到 14 个成员。按照频率顺序,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是现任或前任高级管理人员 (通常是校长、院长或副校长)、高教研究人员或与大学任命相关领域的学者、具有政策背景的个人或是行业代表。国际咨询委员会似乎主要由西方国家男性主导,他们一般隶属于著名院校。

国际咨询委员会中普遍存在着开放和固定术语。一些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在被任命之前与大学有一些关系——通过社交网络，在院校发表讲话或其他联系。

会员同意加入国际咨询委员会是出于一种服务和帮助意识。他们有时被特定的院校及与该校的关系、大学所在国或他们感兴趣的特定专业领域所吸引。关于成员们的参与，他们确定了有价值的几个主题：学习机会、学术服务、影响政策的机会，以及与委员会中其他成员及大学中同事的关系等。

大多数国际咨询委员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会议，有时还会举行额外的虚拟会议。虽然至少有一个委员会的会议长达一周，并要求成员在校园里开展讲座，但会议通常持续一到三天时间。一些委员会向其成员支付酬金，但大多数委员会似乎不这样做，它们只支付委员会成员的所有旅费。

会议通常包括提供赞助的大学的高级领导小组，他们与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一起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其他教师，有时学生也被邀请参会。会议通常由大学校长主持，有时与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合作。主题包括关于大学发展报告以及大学领导团队希望咨询国际咨询委员会的问题。

他们做什么

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和大学赞助者都认为，国际咨询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就大学整体战略的设计和和实施提供外部咨询。有时，国际咨询委员会提供额外的服务，例如将大学举措向外部支持者，或甚至是大学教师或学校里的其他人进行解释。参与我们研究项目的每个人都强调了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提供全球视野以及来自受尊敬的学术领袖和杰出学者的最佳实践上。国

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不仅仅是顾问，他们更是具备大学内部知识的资深同事，并对大学的目标、价值观和计划有着责任感。

研究参与者普遍认为，国际咨询委员会是有效的——前提是它们组织良好，有明确的目标议程，并得到学术界的认真对待；且如果大学遵循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建议的话。

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建议有兴趣成立有效国际咨询委员会的高等教育机构考虑以下关键问题，以便充分受益于此种倡议：

- 学校是否从国际经验中汲取教训，为关于大学未来的战略决策提供信息？
- 学校在设立国际咨询委员会时的实际目的是什么？是否已通过建立国际咨询委员会并与其成员合作来确定您希望实现的实际目标？
- 就各种意见和经验而言（性别、学术概况和学科、地域分布、实践者和研究人员之间的平衡等），拟议的国际咨询委员会的组成是否反映了合理的多样性？
- 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对学校希望他们能够贡献出力的目的内容等有清晰的概念吗？
- 从院校视角来看，每次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的学习和决策目标是什么？会议议程是否足够重视以实现这些目标？
- 学校是否愿意/能够客观地分享该院校面临的挑战，并以开放的心态聆听建设性指导吗？
- 学校是否拥有相关机制，以期在国际咨询委员会审议后确保系统性的后续行动，并定期监测这些行动的结果？
- 学校是否具有更换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的明确规定，并根据发展议程引进新的

成员？

• 当就大学需要考虑的关键决策寻求更多建议时，除在例会中提供的信息外，学校通过什么方式从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处获得有用的信息资源？

• 学校是否能够有效地组织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预先通知成员并提供后勤方面的帮助？

最后，虽然国际咨询委员会目前主要局限在有意提升国际形象和同行认可水平的大学中，但在符合院校具体使命与特征的领域中追求卓越时，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完全可以受益于国际咨询委员会。事实上，

本文针对的是研究型大学，但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同样也能从国际咨询委员会的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中获益。

注：本文基于《明智建议：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国际咨询委员会》（2016）（Altbach, P. G., Mihut, G., Salmi, J.: *Sage Advic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s at Tertiar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请参见：
http://www.bc.edu/content/dam/files/research_sites/cihe/pubs/CIHE%20Perspective/CIHE_Perspectives_No1.pdf。

以色列专科院校中的课程国际化

Amit Marantz-Gal

以色列萨丕尔学院 (Sapir College) 学术英语讲师

电子邮箱: amitm@mail.sapir.ac.il

以色列高等教育系统的基础建立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 当时正是英国管辖时期, 直至 1948 年以色列国成立之时, 以色列仅有两个学术机构 (理工学院 [the Technion] 和希伯来大学 [the Hebrew University])。其余的大学则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建立的。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项重要的立法改革促成了学术专科院校 (包括普通、技术和职业院校) 的开放, 这是一个里程碑, 它标志着以色列过渡到了一个概念上的新学术格局。

目前, 以色列总共有 63 所高等教育机构: 七所研究型大学, 一所开放大学和 55 所普通院校。在本学年开设时, 预计有 306 370 名学生参加所有学术机构的学士、硕士、博士和文凭课程。在 190 400 名本科学生 (不包括就读于开放大学的学生) 中, 66% 的人就读于专科院校 (数据来源: 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 [Israeli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以色列的专科院校现在是本科教育的重要角色。

尽管以色列缺乏治理和指导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政策, 但通过建立全国伊拉斯谟办公室 (National Erasmus Office)、博洛尼亚培训中心 (Bologna Training Center) 并发展以色列高等教育改革专家组 (Israeli group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expert), 它对博洛尼亚进程的准则投入巨大。

国际化愈发被大学视为一个战略要素, 它可以增加科研机会并提升课程开发的质量。很少有人与实践层面就解决该问题迈出第一步。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欧盟资助的国

际化项目, 重点是流动性、能力建设、课程设计和科研。较之于大学, 专科院校成立时间短、规模小, 所以它们似乎无法面对国际化的复杂性和挑战, 但它们或许也具备一些特有的优势。本文概述了以色列专科院校在国际化过程中的一些潜在促成因素, 特别侧重于课程的国际化。

企业家精神和多元性的院校文化

应对变化和适应不同学生群体的需要是以色列专科院校本质的核心。自成立以来, 以色列专科院校就确定了教学和培训的学术目标, 而科研仍主要是大学的学术目标。然而, 与大学教师一样, 如今专科院校教师也要依据其科研范围和水平受到评估。因此, 许多专科院校正忙于更新并重新定义其院校战略, 试图将科研纳入并鼓励其进入院校文化之中。这一研究重点似乎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国际化。

与大学相比, 专科院校在学术、社会经济背景和种族背景方面满足了更为多样化的学生群体。这些学校更年轻、规模更小, 且通常位于农村。它们也更有活力并乐于接受改变, 高级管理层——学者和管理者——在“梦想不可能的事物”上经验丰富。这种创业文化是许多专科院校的主导价值之一, 成功传递到各层次的校园群体 (教师、学生和管理者) 之中。

以色列专科院校也致力于使所有以色列人获得教育机会, 特别强调周边社区。来自外围地区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贝都因人、

埃塞俄比亚人和俄罗斯移民等少数民族人口，至今仍常被排除于大学提供的精英高等教育之外，但他们可以入读专科院校。因此，在课程及院校管理方面，这些学校在适应不同社区需求和处理多样性问题时更有经验。巴以冲突以及把以色列阿拉伯人列为以色列社会平等公民带来了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这些敏感问题尤其受到重视。可以很容易地说，以色列学院已践行了本土国际化的原则。

因此，那些最初看起来似乎是学校应对国际化新兴需求的内在阻力，可能也会带来一种更具创造性和创业型的院校方法，最终将有助于推动而非阻碍国际化。

课程变化与“中立”的力量

以色列社会由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种族和宗教组成。大学中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反映了这种复杂性，并且，学者和管理者经常发现自己偏离了标准的学术课程，以应对敏感问题、学习困难和课堂内外的紧张局势。在以色列参加欧盟资助的“跨欧洲大学教育交流项目”(Trans-European Mobility Programme for University Studies, 简称 TEMPUS) 的几所大学已经认识到课程国际化在引入课程改革、促进学术课程现代化以及解决现有紧张局势方面可能具备的巨大潜力。

专科院校认为“国际化”一词相当“中性”，没有地方社会敏感性，比如说犹太/阿

拉伯、世俗/宗教、工业/学术界和中心/边缘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学校欣然承认，当这一术语与其活动相关时，师生都更易于接受。凭借把国际和跨文化因素纳入课程内容的过程，专科院校期望学术教师有更多合作，这是成功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

例如，在一所专科院校，课程国际化的目标被确定为课程现代化，“欧洲学分互认体系”(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 的框架一致，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从而促进学生和教职人员的流动性，并注意保持“中立”方法。在整个校园内传播这一国际化举措所获的教师反馈率高于预期。

以色列专科院校开始了国际化进程，尤其是课程国际化，这些院校可以多关注以下几个因素并从中受益。第一，现有的院校创业文化可以用来成功地接纳国际化，因为后者与前者密切相关。第二，在关于如何应对校园多样性问题上，运用所有的院校知识物有所值。第三，如何在整个校园中描绘和理解国际化，这一点需要良好把握。在欧洲，国际化有时可能会被指控为消极联系，例如担心失去院校的国家认同，或不愿采用非母语进行教学。这似乎不适用于以色列的情况。“中立性”可能被证明是国际化的强大驱动力。根据迄今为止在大学课程国际化方面收获的实际经验，国际化似乎在解决犹太—阿拉伯紧张局势方面特别有效。

创造一流大学的卓越计划：起作用了吗？

Jamil Salmi

全球高等教育专家

电子邮箱：jsalmi@tertiaryeducation.org

为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转型过程，中国、丹麦、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政府发起了所谓的“卓越计划”，包括大量注入额外资金以提高大学绩效。虽然许多计划相当新，在过去十年或甚至是最近才启动，但其在影响参与这些计划的大学上作用巨大。因此，评估这些卓越计划的效果势在必行，并且也要从近期及当前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虽然首批卓越计划，特别是在东亚和北欧国家，反映了一项长期的国家政策，以加强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但最近的趋势似乎主要受到全球排名的刺激。2012 年的法国所采取的计划正是如此，它鼓励大学兼并和联盟以期使一些顶尖大学脱颖而出；更多了解该国顶尖大学，2013 年俄罗斯的学术卓越项目（Academic Excellence Project）旨在使五所大学在 2020 年列入全球百强。因此，大多数卓越计划试图促进国际化，以此作为吸引顶尖学术人才的机制，从而加强顶尖大学的研究能力并减少大学的“近亲繁殖”。

评估卓越计划的挑战

衡量卓越计划对受益大学的有效性和影响并非易事，这至少有两个原因：时间和归因。首先，升级一所大学需要很多年，至少需要 8~10 年。由于许多卓越计划最近刚刚启动，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衡量其成效

可能为时过早。在一项卓越计划开始后的最初几年，受益大学的科学产出不可能大幅增加。因此，彻底分析需要花费多年时间在特定国家或跨越多个国家来观察相当大的院校样本，以便进行比较。第二个挑战与归因有关。即使可以在大量院校样本的基础上确定统计相关性，但明确卓越计划如何引起积极变化还需进行深入评估。

在没有对最近的卓越计划进行影响分析的情况下，比较过去十年（2004~2015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中顶尖大学的情况，可以为我们的提供一些信息。取得最大进步的四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大陆地区（在前 500 强大学中新增 24 所大学）、澳大利亚（新增五所大学）、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台湾地区（各新增四所大学）。这四个国家和地区都实施了一项或多项卓越计划，促进了对其顶尖大学的持续支持。

在榜单底部，主要的“失败者”是日本和美国，与十年前相比，这两个国家在 2014 年排行榜中的 500 强大学分别减少了 15 所和 24 所。就美国的情况而言，有趣的是，公立大学跌出排名榜单的比例相对较高，这进一步证实了自 2007 年金融危机以来公共补贴大幅减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院校层面，过去十年中排名上升最多的五所大学是：中国大陆地区的上海交通大学（Shanghai Jiao Tao University）和复旦大

学 (Fudan University), 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大学 (King Saud University), 法国的艾克斯—马赛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ix-Marseille) 和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 (the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它们都获得了各自国家卓越计划的资助。

可以看到哪些积极变化?

除了支持整个大学的改进工作, 许多卓越计划通过建立新的卓越中心或加强现有的中心, 提供资金建立至关重要的群体, 通常侧重于多学科方法。最近的经合组织卓越计划审查发现, 它们的一个主要优点是高影响/高风险的基础研究以及跨学科和合作研究工作提供资金。

卓越计划通常标志着参与国的供资政策的重大哲学转变, 特别是欧洲。例如, 在法国、德国、俄罗斯和西班牙, 所有公立大学传统上被认为在绩效方面同样出色; 然而, 卓越计划已将统一预算资格的原则转向了一个强调竞争性、基于绩效的资金投入模式。

事实上, 对受益大学和/或卓越中心的选拔程序或许是卓越计划中最值得注意的环节。在大多数情况下, 政府的筛选方法包括: 通过同行评议过程, 从众多合格大学中选取最佳学校和发展提案。同行评议过程通常需要专家评估小组参与工作, 评估小组一般由国内和国际专家组成。

由于大学之间的资金竞争越来越激烈, 合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有证据表明, 研究人员在参与国家或国际合作项目时效率最

高。例如, 加拿大卓越讲习计划 (the Canadian program of chairs of excellence) 带来了大学间多重合作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协同效应。

卓越计划另一积极成果是, 它们允许新一代的大学领导者不断涌现。大学的成功转型和升级是卓越计划追求的目标, 这确实需要在寻求学术卓越中大胆的构想能力和改变学术界思维模式的能力。

与卓越计划有关的风险

同时, 卓越计划可能产生负面行为并带来不良后果。因为大多数卓越计划都重视科研, 政策制定者和大学领导必须谨记对教与学质量产生有害影响的风险; 因为大学变得更有选择性, 贫困群体学生的平等机会减少了; 因为所有院校都渴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院校的多样性降低了。几个卓越计划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在于, 由于缺乏适当的治理改革以使学校免受政务的规定和限制, 受益大学倾向于建立平行轨道以保证为其明星研究人员提供积极的工作环境, 如为他们提供最先进的实验室, 以及采取美国式博士学院与大学其他部分隔离运作的模式等, 这或许仍未受到卓越计划资助变革的影响。

注: 本文改编于《全球排名和高等教育地缘政治》(2016) (Hazelkorn, E. ed., *Global Rankings and the Geo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一书中的一个章节。

资助世界一流大学

Alex Usher

加拿大高等教育策略协会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y Associates) 主席

电子邮箱: ausher@higheredstrategy.com

政府总是面临着入学机会和追求卓越之间的选择: 是否应只在少数几所院校上投入资源, 以使它们更为“国际化”; 或是否应把资源投入到更多学校之中, 以进行能力建设和增加入学机会? 在困难时期, 这些选择变得更加棘手。例如, 在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持续的联邦预算赤字, 加之一段时期的经济缓慢增长, 最终导致政府削减高等教育预算。高校常常不得不在其提供教育机会的功能和科研功能之间进行选择, 且后者并不总是占上风。

从许多方面来看, 2008 年以来的世界也处于类似境地: 缓慢经济增长和财政赤字的组合迫使人们在增加入学机会和增加科研强度 (这当然是“世界一流”的基础) 之间做出选择。问题是: 不同国家实际上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呢?

在这一研究中, 我收集了十个国家高等教育院校的实际生均支出数据: 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荷兰、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在这十个国家中, 共有 91 所位列“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 100 位的大学, 因此, 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对准确的情况, 也即在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中正在发生什么。在作为财政能力的衡量标准上, 支出优于收入, 因为后者很难预测, 容易出现突然波动 (特别是在捐赠回报方面), 这不利于长期趋势分析。在可能的情况下, 为减少不同报告方法和支出类别定义的

潜在影响, 考虑到现有数据, 我使用涵盖内容最广的支出定义。

各国院校数据的可获得性差异很大。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可以获得院校层面合理一致的年度数据; 然而, 院校层面的数据在德国、日本和荷兰却是参差不齐, 在法国则没有实际的院校数据。对于前六个国家, “顶尖”大学 (即“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的百强大学) 和其他大学的财务对比是可能的; 而对于其他四个国家, 则只能在国家层面提出整体意见。

探究这些数据得出了几个重要结论:

(1) 自 2008 年以来, 整个高等教育部门的生均支出仅在三个国家增加: 日本、瑞典和英国。在英国, 虽然学生数量上升, 但院校支出增加得更多, 这要归功于 2012 年推出的新学费政策带来的大量资金涌入。这在顶尖大学和整个高等教育体系都是如此; 在这两种情况下, 自 2008 年以来, 生均支出实际增长约为 8%。在日本, 大学的资金略有增加 (略高于 3%), 但学生入学率持平。在瑞典, 机构收入/支出有少量且稳定的增长, 但真正的消息是, 入学人数迅速下降, 这似乎是试图保持质量政策的一部分; 因此, 自 2008 年以来, 生均支出已上升了约 15%。令人惊讶的可能是德国的生均支出与 2008 年并无不同, 尽管联邦政府出台了“高等教育协议” (higher education pact)。这部分是由于基准年的选择 (如果选择 2007 年, 我们会看

到显著的上升), 同时也是因为协议的一部分预期成果已经实现, 即更容易获得大学学习机会。

(2) 只有加拿大、瑞士和美国的“顶尖”大学更胜一筹。在美国,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百强大学的生均收入自 2008 年以来上升了 10%, 而其余部分的收入保持不变或是略有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有能力收取更高的学费并扩展其科研经费, 特别是在主要的私立大学。在瑞士, 所有院校的支出都有所增加, 但“顶尖”大学的学生增长比其他学校慢, 因此, 精英学校生均支出的增长(自 2008 年起为 10%) 高于其他学校(略有下降)。在加拿大, 顶尖大学的生均经费保持不变, 但这比其他学校(生均经费有所下降)更好。

(3) 总的来说, 瑞士、英国和美国是唯一“顶尖”大学在经济危机之后继续增加生均收入的国家。这三个国家已经垄断了“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的前 20 名; 至少在理论上, 这会巩固其领先地位。

(4) 在澳大利亚和瑞典, “顶尖”大学比其他大学更糟糕。在瑞典, 整个高教领域的生均收入增加了 15%, 但由于顶尖大学吸引了更多学生, 因此其生均收入没有增加。在澳大利亚, 整个领域的生均收入下降; 然而, “顶尖”大学(-15%)的情况比整个高教领域(-10%)更为糟糕。

这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引人注目的是, 虽然金钱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大学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它。当然, 金钱似乎对“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短期影响: 如果金钱有所影响的话, 澳大利亚大学可能会表现更差。显然, 院校战略、招聘实践以及大学管理的质

量问题也很重要。

但同样清楚的是, 在高等教育中, 资金投入使许多其他挑战变得更加容易克服。如果现有趋势持续下去, 美国私立大学似乎很可能保持其在国际排名榜上的地位, 甚至可能扩大其领先地位。顶尖的美国公立旗舰大学, 以及英国和瑞士的大学, 会发现应付这些挑战比其他国家的学校容易得多。

在其他地方, 问题似乎是一定程度上的, 新的经费往往只跟随新的学生。也就是说, 大学想要获得更多经费以寻求更为研究密集型的道路, 它们首先必须招收更多的学生, 且主要是本科生。政府可能认为它们以这种方式为大学提供了一笔不错的交易, 但坦率地说, 这并非总是有益。大部分新的资金只是用来教育学生, 而很少有“额外”经费致力于追求卓越。希望其大学追求世界一流地位的政府只需找到将收入增长与入学人数增长相分离的办法。这可能意味着放弃对学费的控制, 或是增加卓越计划的规模或一些其他措施。

为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筹集更多资金的另一办法是使大学更加有效运行, 并在那些可以再投资于科研的院校中找到更多的“利润”。位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的澳大利亚大学已经照此实践了好几年, 世界各国政府可能想看看院校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 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鉴于许多政府目前面临总体财政困难, 较之于等待后续公共资金的投入, 这对于院校继续追寻世界一流地位可能是一个更为有效的方法。

正如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曾经说过:“先生们, 我们已经用光了钱。现在是开始思考的时候了。”

俄罗斯学术卓越的两个主要障碍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科研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在过去几年里, 俄罗斯政府一直投入大量资金以提升 15 所最好的大学, 从而与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竞争并加入全球排名的顶级位次, 这是俄罗斯“学术卓越计划”(the Russian Academic Excellence Project) 的一部分, 也被称为“5-100 项目”(5-100 Project)。最近, 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这些大学中的前七名分别在 2016 年获得了 9 亿卢布 (约 1 500 万美元), 其他几所学校获得的经费略少。自 2013 年卓越计划启动以来, 大多数大学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改革治理、精简行政管理、促进跨学科研究, 特别是提高科研产出。

虽然俄罗斯有着杰出的学术传统, 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以及政府都支持加入全球研究型大学的顶尖队伍, 但获得成功面临着两个基本的结构性障碍, 即将“学术科学”和“医学研究”从大学中分离出来并将其置于专门院校中。还有许多其他挑战, 但这两个结构现实深深嵌入俄罗斯的学术结构之中, 如不改变它们, 俄罗斯大学将不可能具备充分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的结构性挑战

第一个也是最为根本的障碍是“科学院”系统, 它传统上将科研定位在属于俄罗斯科学院的大量独立研究所之中。大学传统上被赋予教学任务, 并且只有适度的科研预算:

研究型大学的公共拨款与科学院所获的经费不同, 前者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另一个基本的结构障碍是将医学教育和科研的责任与大学分开。俄罗斯联邦卫生部 (the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不是负责监督大多数大学的教育和科学部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掌管医疗保健系统、培训医务人员的专业院校以及大多数医疗相关研究。

然而, 变化可能正在发生。教育科学部长迪米特里·利瓦诺夫 (Dmitri Livanov) 已起草了一项新的联邦法律, 将取代现有法规, 强调大学科学和研发的作用——与俄罗斯学术科学的作用有关, 并减少管理科学政策和实施上的官僚作风, 现在这是高等教育部门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利瓦诺夫部长取得了一些进展, 他试图进行改革以限制科学院的权力。毫无疑问, 这一新举措将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

学院系统

尽管俄罗斯科学院于 1724 年由彼得大帝创立, 但在俄罗斯革命后, 它被塑造成为当前的形式。今天, 所谓的科学院机构系统, 在 2013 年的改革之后, 现由俄罗斯联邦科学组织联邦机构 (the Federal Agency of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监督, 大约有 700 个研究所和研

究中心以及 5.1 万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时期, 这些机构专注于特定的知识领域, 几乎没有机会进行跨学科研究。最有才华的研究人员被科学院雇用, 除研究外他们享有更高的薪酬、肩负更少的责任。由于政府自动为他们分配了资金, 所以他们一般不需要像其他国家的同事或俄罗斯大学的同行们一样, 申请竞争性的研究补助。尽管许多研究机构只赞助研究型博士学位课程, 但这些机构几乎没有教学责任, 与大学几乎没有联系。这种基本结构一直持续到现在。

苏联解体后, 科学院和大学都缺乏资金, 一些领域的科研标准显著下降, 如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 在苏联意识形态中, 这些学科从来都不太强大, 它们遇到的困难最多, 而与此同时科研标准在自然科学学科变得更好了。许多科学家和学者 (据估计,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十年间高达 7 万人) 离开了该国。其他人进入如教育或商业等其他领域。基础设施失修, 或在某些情况下被出租给企业。科学院得益于其较高的声望和法律独立性, 因此, 并没有什么激励科学院机构做出改变, 许多评论家指出生产力严重下降。在某些情况下, 学者在大学中有联合任命——但通常这样的职位并不意味着很多的合作。在大多数情况下, 俄罗斯“知识体系”中两个关键部分的分离仍然存在。

目前, 在竞争的基础上获得额外资金, 大学比科学院更加有效。例如, 大多数科学院的经费直接来自于政府, 但大学研究支出中只有 37% 来自政府——其余经费来自企业、基金会和其他领域。

医学教育与科研

俄罗斯的医学教育和科研传统上是卫生部 (the Ministry of Health) 的责任, 有 46 所

医学院是独立的专门机构, 几乎没有 (甚至完全没有) 医学院与大学或俄罗斯科学院有所联系——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在 2013 年改革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从历史上看, 医科大学保持了同样的教学和科研分离, 医学院是卫生科学研究的主要提供者。换句话说, 医科大学校主要是教学机构, 虽然一些顶尖学校有重要的科研属性。

同时, 一些大学和科学院在生物医学、物理学等上升领域中发展了与健康科学相关的研究方面的专门知识, 实际上, 这是一个上升趋势。医科大学与俄罗斯其他高等教育或研究系统之间似乎缺乏协调或合作。追溯到苏联时期, 科学和高等教育已存在于孤岛之中, 小规模、高度专门化的机构隶属于特定部门。医学领域正是此种遗留物的一个主要例子。

现在的安排阻碍了诸如生物技术、药学等领域的跨学科医学研究, 这些研究将受益于大学和科学院相关院系的工作。这减缓了俄罗斯的创新进程。俄罗斯的 46 所医科大学和学院中的许多学校可以合并, 或至少与大学合作, 以鼓励前沿研究和跨学科工作。事实上, 大多数医学教育都需要研究, 特别是要关注生物技术和相关领域的新发展。

结语

俄罗斯科学系统遭受的破坏仍然很大。现在的安排剥夺了大学的科研经费, 抑制了跨学科工作, 分离了先进知识创造和传播的两个主要维度——教学和科研。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 由于远离大学, 老龄化的科学院已切断了其与年轻一代科学家的联系。特别重要的是跨学科性。许多领域科学研发的未来取决于跨学科方法。由于结构和人员原因, 科学院往往保留在其专业领域之中,

而至少有部分顶尖大学允许在学习领域之间有更灵活的界限。

然而，仅把具有相当不同传统和组织模式的现有机构合并不会奏效。我们需要关于如何把不同类型机构和各种科学和研究方法

联系起来的新的创造性思考。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关键的组织上的相关问题，俄罗斯渴望加入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顶端的愿望将无法实现。

越南的私立高等教育：治理与政策问题

Dao T.H. Nguyen

越南教育发展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研究员、营运管理者

电子邮箱: nth.dao@IRED.edu.vn

越南当代的私立高等教育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 院校数量急剧增加, 从 1988 年仅有一所学校上升至 2000 年的 22 所、2010 年的 77 所以及 2013 年的 83 所。在 2005~2009 年间, 最显著的增长超过 50%, 以此回应对高学历劳动力的经济需求。目前, 私立大学数量占高等教育机构的 20%, 其入学人数约为学生总数的 15%。在与公共部门一起提供高等教育上, 私立院校的作用在越南越来越大, 从而降低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预算。

越南的私立大学一般是需求吸收型的。它们在校园规模、学生和教师人数和质量方面逊色于公立大学。它们受到社会和制度问题的挑战。治理和政策问题目前似乎更加紧迫, 并使它们面临生存危机。为找到解决这些问题可靠且可行的解决方案, 2015 年我们开展了一个质性多地点的案例研究, 以深入了解越南私立高等教育的治理和政策问题。该研究采用了文档分析和深度访谈的方法, 访谈涉及来自不同区域, 历史、规模、声誉和课程项目各不相同的七所私立大学的董事会成员和管理人员。抽样方法通常是分层抽样和立意抽样。

内部治理的紧张关系

与世界各地的私立大学一样, 越南私立大学的顶层组织结构包括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董事会和校长。但每个组成部分的权力

和观点因国而异。在越南, 董事会在法律上被称为“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 发声和运作与董事会相似。成员作为投资者、所有者以及具备影响力的大学股东而发挥作用。根据其财务投资, 拥有一定数量的投票和股息是合法的。校长由董事会任命, 担任大学的最高管理者或最高行政人员。他/她被认为是代表了学术界, 但很少或是没有资金贡献给大学。在某些情况下, 他/她也是一个董事会成员, 其投票与他/她的财务贡献成比例。

对选定的董事会成员和管理人员的访谈揭示了董事会和校长在院校管理中的紧张关系。大多数董事会成员偏好其大学由利润驱动, 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并增加投资回报, 而校长和少数董事会成员则提倡公共利益或是院校的非营利目的。

对法律文件的分析——2010 年第 58 号决议、2009 年第 61 号决议和 2011 年第 63 号大学法规——揭示了政府当前的要求导致了这种紧张关系。它们赞成支持私立院校营利性的人。因此, 它们将国内所有的私立大学统一为营利性机构。

最近, 为解决这个问题, 一项新的决议 (2014 年第 70 号) 已经颁布, 以取代先前的正式文件。它阐明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院校在组织结构和收入使用方面的区别。然而, 许多问题仍需仔细考虑, 特别是关于董事会

的核心性质以及财务机制及管理。新文件继续申明，与公司股东一样，财务捐款人有权获得财务利益和权利，虽然股息上限是现行政府债券利率的比率（如 2014 年第 70 号决议中第 32 条所规定）。

外部治理的紧张关系

受访者提到的第一种紧张关系是院校为获得正式成立与运作的许可证与繁琐、复杂和耗时的文书程序间的斗争。院校还必须在前 10 年间为其成立和运作努力应付土地、特许资本和设施上无法承受且不切实际的要求。

第二，所有受访者都抱怨政府对学术做了许多规定，这些规定是任意的，且阻碍了其院校的发展。大学和教师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受限。一些突出的例子是：适用于所有大学的统一国家入学考试；适用于所有大学学生入学的严格“底线”（最低入学考试成绩）；要求提交计划课程和计划学生招生，以便在每个学年之前申请教育和培训部的批准；采用国家课程框架，其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国防教育必须占总学分的六分之一。

第三，机构外部治理波动很大——有时宽松，有时严格，这取决于高级官员的任期。一位受访的行政管理人员表示，她所在院校的活动（如学术课程提供和财务管理）很少由前一任期的地方政府检查，但最近学校常受当前地方政府的控制。

限制性和不平等政策

根据 2005 年“教育法”、2012 年“高等教育法”和附属法律文件所述，越南私立大学没有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然而，2008 年，

政府在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文化、体育和环境领域实施了一项鼓励社会化（即社会参与）的政策。根据这项政策，鼓励向私立院校提供优惠清点、长期使用土地权、激励性税收税率和一些软贷款。实际上，这些特权并非平等地提供给所有院校，因为地方政府的承诺和能力不同。与此同时，所有公立院校都从国家资助中得到了大量资源以建设校园、购买设施，并获得了年度增值、研究经费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的奖学金。

在支持学生入学和学业成功上，通过社会政策银行制度，政府仅提供一个优惠贷款方案。然而，贷款并没有太多的帮助学生，因为生均贷款额度处于中等水平，也因为许多情况下，这些贷款被分散和滥用。

建议和结语

治理紧张局势和限制性的政府不平等政策是挑战越南私立高等教育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问题。通过改变现行立法和政策，这些问题应该立即解决。为缓解内部治理的紧张局势，区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机构的概念和标准应当清楚告知，不仅是在顶层组织结构成员的性质和权力之中，也应该是在财务机制和管理之中。为缓解外部治理的紧张局势，政府应减弱其支配性和集权性，更多地支持私立大学。就政策而言，在提供贷款、学生奖学金、教师科研经费以及择优和应需（院校）拨款时，应考虑公平竞争。所得税的减免也应适用于鼓励对非营利性机构提供更多财务捐助。如果这项税收政策启动并获得成功的话，一种传统和文化将有望很快在越南社会建立起来，由此，非营利性私立大学的捐赠者将不再要求其捐款获得财务回报。

拉丁美洲私立高等教育的关键存在

Dante J. Salto

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 (the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rdoba) 博士后研究员, 参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大学 (University at Albany) 私立高等教育研究计划 (the 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电子邮箱: dantesalto@gmail.com

2016年3月4日至7日, 主要的拉丁美洲高等学者和实践者举行了“首脑”会议, 以反映其领域的主要发展和趋势。私立高等教育不是会议的唯一焦点, 但在许多有意义的讨论主题之列。本文阐述了峰会上强调的私立高等教育以及密切相关的问题, 如私有化和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比较。

在会议期间反复强调的一个中心现实是, 任何严肃和全面的关于拉丁美洲高等教育和相关政策重要发展的讨论都必须涉及私立高等教育。这一现实并不奇怪, 因为超过40%的拉丁美洲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存在于私立院校之中 (私立高等教育研究计划数据)。私立高等教育的关键作用体现在各种问题之中, 包括质量、入学机会、扩招、公平、监管政策 (包括认证)、新的公共管理、学术和声誉排名以及腐败等。

与区域发展密不可分

在峰会期间处理的许多历史发展和趋势涉及该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的扩张, 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多样化。一位主讲嘉宾——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专家和协调员弗朗西斯科·马尔莫莱霍 (Francisco Marmolejo) 指出, 该区域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是基于扩大的“人口机会窗口”(demographic window),

劳动年龄的成年人越来越多地接受高等教育。现在, 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仅来自达到传统高等教育年龄的年轻人, 而且来自非传统学生——即迄今为止公立和私立院校尚未给予大量考虑的群体。这种非传统群体愈发成为替代性私立院校——不一定是大学层次的, 也不一定是学位授予——以及一些最近建立的公立院校的目标。因此, 在吸收不能通过传统院校满足的需求方面, 私立院校发挥着并将持续发挥重要且不断发展的作用。

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对诸如质量保证等监管政策提出了挑战。近期在拉美国家发生的一个普遍现象是, 正式的质量保证体系通常依赖于一个单一的“最优”院校模式, 与一个国家最负盛名的公立大学相一致。适应各种新的院校使命是质量保证体系面临的持续挑战, 新型私立教育形式的兴起加剧了该挑战。

弗朗西斯科·马尔莫莱霍的发言进一步强调, 多样化和私有化不仅涉及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市场友好型的改革推动了该地区的公立院校加强内部私有化。伴随全球趋势, 公立院校采用了各种策略以实现私有化。创收产生重要作用且常引起争议。公立大学逐渐寻求外部资金并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逐渐放弃其长期依赖国家作为唯一财务和责

任来源。同样，专家小组成员说明了公立大学对私营部门的治理做法（共管理改革）的适应是如何导致公共—私营部门的区别变得模糊的。一些发言者想知道这些趋势在何种程度上表明公立大学正在具备创业精神，因为它们正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传统与新型不断演化的私有化形式间的对决

拉丁美洲私立高等教育中的问题，从长期问题到新兴问题不尽相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人口变化或政治和经济趋势等情境因素驱动的。探索历史发展和当前趋势的学术研究强调了私营部门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一些研究集中于公共政策如何忽略甚至是抑制私营部门的扩张，而其他研究则将公共政策描述为促进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公私部门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私立院校更加大胆地声明它们实现了公共目的，例如满足政府的高等教育入学目标。

当然，入学人数增长以满足入学目标这个问题在半个多世纪的拉丁美洲政策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吸引了人们对私立高等教育的关注，因为通过提供私立教育实现了扩招。但峰会聚焦于当前时刻，探索这种增长如何在新的和不断变化的私立高等教育形式中越来越多地出现。该地区的几个国家当前允许合法营利型院校存在。这种打破传统和传统规范的现象自然引起了争议。最值得注意的营利性事件发生在该地区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以绝对入学率衡量）——巴西。巴西不仅允许营利性院校，而且在财政上鼓励它们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入学机会。其他参与营利性趋势的国家包括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只有非大学）。

虽然不如营利性增长那么戏剧化，但“美

国化”管理主义的各个方面有助于重塑拉丁美洲高等教育。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这种管理主义在该地区的私立高等教育中蓬勃发展。例如，私立大学倾向于雇用管理专业人员，而不仅仅是要求学者担任管理人员。但与会者还提供了公立院校中管理主义增强的例子，特别是在一些较新的院校中。同样，现在甚至是公立大学也在其治理结构中吸收更多外部人员。这被视为对各类外部利益相关者也可能是普通公民增强责任制的转变。公共部门的这种趋势进一步模糊了私立和公立高等教育之间的传统分歧。

有关私立高等教育正在进行的研究

最后，峰会记录了为研究拉美正在发展的私立高等教育和相关的公私事务所做出重大努力。区域机构、联盟和研究中心都发挥了清晰可见的作用。由峰会参与者何塞·华金布·伦纳（José Joaquín Brunner）先生协调，“校级发展中心”（the Centro Interuniversitario de Desarrollo）发表了有关拉美高等教育当前问题的报告，其中包括关于私营部门作用的章节。美洲开发银行（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正在重新编写拉美私立高等教育的政策报告。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参与了一个关于天主教大学国际化的项目。私立高等教育研究计划继续在全球范围内研究拉美的私立高等教育。

无论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会产生何种未来知识，峰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在努力理解已经掌握的知识。总而言之，由于他们解决了拉美高等教育中的许多突出问题，他们反复指出，私立高等教育和相关的私有化现实（一些是长期的，一些新出现的）是如何准确地说明了私立高等教育对于这些总体发展是多么重要且密不可分。

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的收入多元化与改革

Kibrome Mengistu Feleke

埃塞俄比亚巴赫达尔大学 (Bahir Dar University) 心理系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讲师、
研究员

电子邮箱: kbmen1973@yahoo.com

大约二十年前, 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系统有以下特点: 入学机会极其有限、不公平、质量低下、科研产出薄弱、资金不足。为确保入学机会、公平、质量、相关性和效率, 埃塞俄比亚政府自 1994 年以来对高等教育部门进行了重大改革及政策调整。

改革后, 该系统在过去二十年中大规模扩大, 从原来仅有的两所公立大学扩展到现在的 36 所公立大学。私立高等教育自 1997 年以来也蓬勃发展, 98 所私立院校接纳了约占总入学人数 15% 的学生。这种快速扩张使本科生入学人数从 1996 年的 3.5 万人左右增加到 2014 年的 593 571 人。高等教育入学率随之从 1996 年的 0.8% 增长到 2014 年的 9.4%。

政府在过去二十年间对高等教育的大量投资带来了大规模扩张, 建立了更多大学, 提升了入学机会, 增加了课程的多样性, 并且总入学人数翻了五倍。这些成就是非凡的。然而, 这种大规模扩大的系统需要持续且可靠的公共收入。

财务挑战

在埃塞俄比亚, 政府提供了运行高等教育系统所需的几乎所有资金。高等教育系统只有在其资金水平足够且稳定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目前的扩张。因此, 自 2000 年以来, 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已占总预算的一部分。同样, 高等教育预算因最近的扩张而增加, 从教育预算总额的 15% 增加到约 30%。

虽然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的总预算多年来显著增加, 但国家预算还不足以涵盖大规模规模的扩张。因此, 大学正努力为不断扩大的系统提供必要的资源。随着将进入低成本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数与进入需要更多资源的高成本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人数调整为 70:30, 财务压力变得更加严重 (根据 70:30 的政策, 入读公立大学本科生总人数的 70% 应进入自然科学领域, 其余 30% 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尽管有这种财务背景, 但该系统仍在扩张, 直至 2020 年, 埃塞俄比亚将建立 11 所新的大学以提供更多入学机会。

因此, 处于这种面临财务挑战的时代, 埃塞俄比亚大学似乎必须设法扩大非政府收入来源, 以满足其巨大需求。同样, 它们需要从不同来源筹集资金, 从而提高其财务能力。

收入多元化的压力

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以缓解入学压力并保持入学机会的财政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教育使收入基础多样化的能力。收入多样化有助于在公共资金有限的系统中保持快速扩张。大学积极参与创造额外收入有助于减少它们对政府的依赖, 并减弱其易受公共预算波动影响的性质。

随着埃塞俄比亚目前的大规模扩张以及政府为这一扩大系统提供资金能力的削弱, 公立大学需要通过从非政府来源获得收入, 从而增加并多样化其收入基础。收入多样化

使埃塞俄比亚的大学能够创造额外收入，并随之改善教育基础设施。

因此，埃塞俄比亚的高等教育宣言为公立大学提供了从非政府来源获得收入的自由，目的是补充公共预算。该宣言规定了有关高等教育的总体政策和改革问题。该政策有利于刺激替代资金来源的开发。因此，大学可以自由接纳付费学生、提供有偿教育服务、接受捐赠、建立商业企业以及从事其他合法活动以增加收入。

院校趋势

伴随着鼓励院校创造新收入的有利政策，埃塞俄比亚的大学建立了各种机制以从非政府来源筹集资金。目前，几乎所有大学都通过在不同课程项目中接收付费学生而产生大量收入。因此，学费收入现已成为多数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越来越多的大学通过研究项目、培训和咨询来提高收入。学校也通过捐赠、拨款和双边协议获得大量资金。

该政策还允许创收企业像任何其他商业组织一样运营。因此，一些大学已建立了商业型企业，以从额外收入中受益。

总的来说，一些大学已开发了教育、科研和产业合作来寻求拨款和捐款。因此，从收费教育服务、补助、科研合作、各种商业活动以及其他来源产生的收入在该国许多公立大学中大大增加。

院校差异与收入不均

大学通常在校龄、地理位置、工作人员情况、校友和课程项目多样性方面有所不同。由于这种差距，院校创收的能力存在极大的不平衡。年代久远、设施完备的大学能够更好地筹集资金并获得企业和捐助者的赠款，而新的大学很少获得这种资金。此外，较之

于位于高度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大学，建立在欠发达地区的大学创收机会相对更少。

质量挑战

在高需领域提供课程的大学能更好地招收更多付费学生。因此，为吸引更多学生，许多大学目前提供面向市场的课程培训，即便这些学校没有必要的资源来支持此种培训方案。一些大学也可能倾向于降低入学标准，招收大量付费学生并以此作为增加学费收入的一种手段。这可能导致招收低于标准的学生，从而影响教育质量。

前方的路

一般而言，埃塞俄比亚公立大学有巨大潜力向工业和私营企业提供各种服务，从而创造收入。许多大学的经验表明，它们致力于增加非政府收入来源以支持其机构的运作。

尽管这一图景充满希望，但许多大学创收的战略似乎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来源。因此，院校并没有使其收入来源充分多样化。此外，大多数院校的创收活动没有得到系统及战略性的支持。总而言之，这些收入的益处未在极大推动院校卓越上得到充分利用。

为成功制定其战略并使其收入来源多样化，大学应建立适当的行政结构。此外，从各种来源创造的收入应主要用于支持大学核心使命。为此，应给予大学足够的自主权以保持额外收入：现在对个别大学还有外部干预。大学还应通过各种激励机制，鼓励工作人员参与创收活动。

总而言之，非政府收入份额的增加有助于补充公共预算。因此，收入多样化应被视为补充性收入及互补性活动的重要来源。然而，在追求新收入来源的同时，大学必须保持其核心价值观。

西巴尔干地区的高等教育：近期趋势和挑战

Lucia Brajkovic

美国教育委员会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 lbrajkovic@acenet.edu

近来欧洲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已被人们广泛讨论和研究, 相关文章也已出现。然而, 位于东南欧地区的西巴尔干地区仍未得到充分研究, 该区域包括七个国家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马其顿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科索沃、黑山, 以及塞尔维亚), 总人口为 2 270 万。缺乏先前研究主要是因为缺少关于国家和院校层面的系统数据收集。本文介绍和分析了该地区学术界面临的一些最为显著的挑战和问题。

入学、毕业率和结构问题

在西巴尔干地区, 绝大多数高等教育学生都就读于公立院校。虽然该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相对较高——平均而言占传统适龄大学生群体的 50%——但学业完成率相当低。据估计, 十年内克罗地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学生的平均毕业率低于 40%。这些教育结果加上结构性问题和高失业率为西巴尔干地区国家带来了重大挑战。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解体, 战争随之爆发, 该区域的大多数国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过渡时期。政治和结构性弱点 (即效率低下的官僚结构、薄弱的政府问责制和腐败) 继续影响着各国的学术部门, 特别是因为它们受到各自政府的监督。该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也受到了因权力政党更迭 (即保守政府经常改变以前的自由立法, 反之亦然) 而带来的连续且通常是矛盾的政策的影响。这种社会政治背景和相关做法导

致这些国家在生成长期国家战略目标上的停滞。

大学仍几乎完全由国家政府资助, 政府非常密切地参与关于向高等教育机构分配资金的决策过程; 学校必须遵守政府的规则, 即使是在诸如学生入学配额和教师及管理人員的薪水等事项上。鉴于这些情况, 当地学术界要求进行改革, 主要涉及增加机构自主权和摆脱直接国家监督; 提高教育质量和科研生产力; 整合并专业化大学领导层及管理。

另一个结构性问题是缺乏院校或国家一级的计划, 以抵消学费成本并确保低收入和服务匮乏地区群体的平等入学及这部分学生的保留率。

该地区的一些国家至少为部分学生免除学费, 某些院校也会提供部分财政援助, 以及以国家奖学金的形式资助。然而, 这些数额在涵盖学生所有教育相关费用, 例如学费、书本和生活费上仍远远不足。在一些国家正在进行一些项目, 以得出解决方案并引入更加健全的学生援助系统 (例如, 克罗地亚教育发展研究院 [the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正在开展这种项目)。

私营部门的发展

在西巴尔干地区, 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快速发展源于该地区特殊的政治环境 (即从社会主义政权过渡到市场经济), 以及学生需求的迅速增加。一些国家, 特别是在前南斯

拉夫解体后参与武装冲突的国家，缺乏制订全面高等教育政策和战略的能力，因而导致了私立（通常是营利性）院校的激增。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私立院校的经验并不具有积极影响。这些院校通常代表那些没有进入公立大学学生的第二选择。如果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大学的地位，私立院校倾向于在其名称中使用“大学”这一称谓，即便它们只提供职业或两年制学位。在系统层面，私立院校的出现并没有对课程多样化做出重大贡献；私立院校提供的绝大多数课程都在有利可图的领域，如商业、信息技术和旅游业。

西巴尔干地区的私立院校通常缺乏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自公立院校的教师，他们为其原属院校以及私立院校服务。兼职、合同工以及雇用没有博士学位的从业人员和教职员是最主要的做法。教师“兼职”也大大影响了公立大学的教育质量。在一些国家，人们一直呼吁强化法规以及提高私立高等教育的透明度。

欧盟资助

欧盟对“知识型”经济的投资描述也渗透到西巴尔干地区的国家。然而，尽管成员国和候选国有资格申请欧盟资助研究和开

发，但西巴尔干地区的院校对这些资源的竞争非常困难。发达国家能够在必要的专门知识和基础设施上投入大量资源以成功利用这些资金来源，与发达国家不同，这些国家可供使用的资源相当有限。因此，西巴尔干地区从欧盟获得的资金比例仍然很低，因为欧盟现有的资金机制使欧洲资金分配的现状持续存在。如果无重大调整，这种方法可能导致西方国家较富裕学术领域与欧盟边缘地区间质量和生产力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政策注意事项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该区域的决策者应避免采用不符合各国具体需求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政策，而且必须有充分的资源分配。能够在高等教育上实质投入更多财政支持的发达欧盟国家被视为西巴尔干地区国家遵循的范例。然而，转型后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在该地区）表明，这些社会的一些制度性和系统性挑战超过了发达国家曾经面临的任何问题，例如严格的政府监督与低效的官僚结构配合、缺乏长期战略，且在某些情况下，腐败也是挑战之一。如不考虑这些因素，采用各种一般趋势和政策可能会使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部门面临的现有问题恶化。

新书速递

Berg, Maggie, and Barbara K. Seeber. *The Slow Professor: Challenging the Culture of Speed in the Academ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6. 115 pp. C\$26.95 (hb). ISBN 978-1-4426-4556-1. Website: www.utpress.utoronto.ca.

本书提出了反对大学企业化的论点,主张关注科研和教学。现代学术生活的快速步伐阻碍了人们对重大问题的认真思考。作者在企业时代要求人们仔细思考人文教育。

Douglass, John Aubrey, ed. *The New Flagship University: Challenging the Paradigm from Global Ranking to National Relevancy*.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16. 216 pp. \$100 (hb). ISBN 978-1-137-50048-9. Website: www.palgrave.com.

本书讨论了旗舰大学的性质和作用,这些大学是专注科研的学术机构,且处于国家学术体系的顶层。作者讨论的主题包括排名在塑造旗舰大学中的作用,以及旗舰大学在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作用,如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拉丁美洲等地区。

Ferrara, Mark S. *Palace of Ashes: China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240 pp. \$29.95 (hb). ISBN 978-1-4214-1799-8. Website: www.press.jhu.edu.

本书讨论了中美高等教育过去和现在的发展,提出美国高等教育的衰落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兴起有关。本书讨论了这两个国

家的发展。

Goastellec, Gaële, and France Picard, eds. *Higher Education in Societies: A Multi Scale Perspective*.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2014. 213 pp (pb). ISBN 978-94-6209-744-5. Web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

本书包含了来自高等教育研究者联盟(the Consortium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s)会议的论文。其中大多数文章关注的是欧洲和北美的入学问题。

Jarton, Michèle. *IFCU: A Prophetic Organization*. Paris: FIUC, 2016. 406 pp Euros 32. ISBN 978-88-209-9567-6.

本书介绍了国际天主教大学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atholic Universities)从1924年成立之时直至现在的历史,本书提供了该组织的活动及其领导人的信息,并提出了对天主教大学现代发展的一些见解。

Luescher, Thierry, Manja Klemencic, and James Otieno Jowi, eds. *Student Politics in Africa Representation and Activism*. Cape Town, South Africa: African Minds, 2016. 267 pp. (pb). ISBN 978-1-928331223. Website: www.africanminds.org.za.

学生政治行动主义是全世界高等教育日益突出的问题。本书聚焦于非洲,其中有章节专门叙述大学治理中的学生代表以及更多传统形式的行动主义。本书提供了非洲英语

区和法语区一些国家的案例。尽管本书关注的是非洲，但它也与国际读者相关。

OECD. Trends Shaping Education 2016.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6. 120 pp. (pb). ISBN 978-92-64-25017-8.

Website: www.oecdbookshop.org.

本书是经合组织的出版物，旨在激发人们思考有可能影响教育的主要趋势，以及教育影响这些趋势的潜能。本书是第四版，已有很多更新的内容，特别强调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联邦等新兴经济体。本书聚焦于全球化、民族国家的未来以及城市、现代家庭和新技术的新兴的重要性等话题，提出了 2016 年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一些有趣反思。

Reflections of South African University Leaders, 1981 to 2014. Cape Town, South Africa: African Minds, 2016. 181 pp. (pb). ISBN 978-1-928331094.

Website: www.africanminds.org.za.
这本精彩的著作聚焦于对八位南非副校长的访谈，他们在国家关键转型期服务于大学。这些思想丰富的大学领导的经验和反思带来了有关大学领导层以及大学所面临的实际挑战的深刻见解。

Rhoads, Robert A. MOOCs, High Technology, and Higher Learnin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184 pp. \$29.95 (hb). ISBN 978-1-4214-1779-0.

Website: www.press.jhu.edu.
本书是广义视角中对慕课的关键分析，本书讨论了知识传送中连接性如何起作用、抵制慕课以及高等教育在慕课的背景下不断

变化的组织系统。本书最后讨论了慕课的未来。

Savicki, Victor and Elizabeth Brewer, eds. Assessing Study Abroad Theory, Tools and Practice. Sterling, Virginia: Stylus Publishing, 2015. 335 pp. \$35 (pb). ISBN: 978-62036-214-3.

Website: sty.presswarehouse.com.
通过讨论海外留学的结果以及如何衡量并理解这些成果，本书探讨了出国留学的概念。在介绍了海外留学领域的评估如何发展以及为何发展后，本书的第一部分分析了海外留学经验的不同要素。本书的第二部分概述了评估海外留学的合适工具和策略，强调了认真制定评估问题并确定其优先顺序以及了解不同工具优缺点的重要性。

Tiede, Hans-Joerg. University Reform: The Found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268 pp. \$34.95 (hb). ISBN 978-1-4214-1826-1.

Website: www.press.jhu.edu.
本书是关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第一个十年的历史，该协会成立于 1915 年并对现代美国高等教育学术职业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本书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作用的角度出发，讨论了诸如终身教职制度的发展、教师在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其他重要问题。

Varghese, N. V. and Garima Malik, eds. India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2015.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467 pp. (hb). ISBN 978-1-138-12117-1.

Web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是有关印度高等教育当前问题的年度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书中提供了 18 篇涉及关键问题的详细论文。主题包括高等教育政策中的新兴趋势、数量扩大、社会群体差异、性别问题、质量保证、毕业生就业能力、高等教育和国际迁移、公共支出、私立高等教育趋势、机构自主和领导、国际化等。本书由国立教育规划和管理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新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赞助。

Walenkamp, J.H.C, ed. *The World's Mine Oyster, Studies in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Hagu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The Hague: Utigeverij Eburon, 2015. 204 pp. €34.75 (hb). ISBN: 978-94-6301-022-1. Website: www.eburon.nl.

本书汇集了来自海牙应用科技大学（the Hagu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的国际合作研究小组（the Research Group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书中的研究从多个角度讨论了跨文化能力，从学术能力到就业能力。在本书中，全球公民的主题被确定为一个重要方面，以促进毕业生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了解和关心世界面临的挑战，并具备在愈发国际和多文化的文化社会和劳动力市场中表现良好所需的国际和跨文化能力。

Yang, Dennis T. *The Pursuit of the Chinese Dream in America: Chi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6. 161 pp. (hb). ISBN 978-1-4985-2168-0. Website: www.rowman.com.

本书的标题基于博士论文，可能有点误导性，因为研究报告是基于对中国上海两所高中的学校、家长和教师的访谈，涉及海外学习（主要是在美国）的兴趣和动机。本书讨论了受访者对申请美国大学的看法，他们对国际教育的看法以及其他相关主题。

Zgaga, Pavel, Ulrich Teichler, Hans G. Schuetze, and Andrä Wolter, ed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Looking Back—Looking Forward*.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Peter Lang, 2015. 431 pp. (hb). ISBN 978-3-631-66275-5. Website: www.peterlang.com.

本书是关于大学改革和相关问题的全球概览，本书具有多重视角。书中主题包括入学机会和社会阶层问题、高等教育政策的冲突叙事、高等教育的大众和市场、欧洲大学的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趋势等。书中大多数章节在斯洛文尼亚的一次会议上呈现。

Universidad de Palermo—Cátedra UNESCO-UNU. *Colección de Educación Superior (Higher Education Series)*. Multiple authors, multiple editors. Website: <http://www.palermo.edu/cienciassociales/investigacion-y-publicaciones/coleccion-educacion-superior/index.htm>.

巴勒莫大学（the Universidad de Palermo）高等教育系列的书籍不断增多，包含译著（主要是英语）以及西班牙语新著作的有趣组合。